

执政党的建设 论纲

主编 张连月 王士兵 孟繁彪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执政党的建设论纲

主编 张连月 王士兵 孟繁彪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京)第164号

执政党的建设论纲

主编 张连月 王士兵 孟繁彪

责任编辑：凤珍 封面设计：张毓

*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二号)

石家庄市建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5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1002-471-X/G·28

定 价： 3.80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二、执政党的特殊运动规律	(4)
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18)
第一章 执政党建设的根本——继续坚持党的	
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23)
第一节 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	
级先锋队性质	(23)
一、建设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党是个根本	
问题	(23)
二、在新时期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先进的	
阶级	(25)
三、坚持党的性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根本保证	(25)
第二节 把党的建设的更加成熟更有战斗力	(27)
一、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	(27)
二、毫不动摇地把党的建设成为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29)
三、坚持正确的组织原则，维护党的高度	

绪 论

一、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执政党的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探索和研究的是关于党在执政条件下所具有的特点，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怎样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等问题。

党的建设曾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法宝。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一客观进程的推进，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实现的。共产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无产阶级无论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自己的政党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共产党也完全可以领导革命、领导改革和建设取得胜利。但这一领导能不能实现、实现程度怎样，则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责无旁贷地承担了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共产党自身状况就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的命运客观地联在了一起。近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发展方向，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制度改变，其原因甚为复杂，有外因，也有内因，但重要的一条是原来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没有把自己内部建设好。新中国建立后，也有过几次大的曲折，如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这些错

误也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先由党内产生的。当然，这些错误也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当错误产生时，国家动荡，社会主义事业受损；当错误由党自己纠正后，国家安定兴盛，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执政党的状况同整个大局息息相关，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息息相关。因此，邓小平特别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在把我们共产党自己内部搞好。因此，党的十四大特别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当然，仅仅看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还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当前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性。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我们现在所“直接碰到的”是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我们面对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党必须认真总结和吸收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抓住时机，以朝气蓬勃的新面貌站在时代潮头。同时，我们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内，现在也处于一个特殊重要的历史时期，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对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很重要很宝贵的时期。在90年代，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的努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纪中叶，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任务能否完成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现在，我们已经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历史赋予的这个重任就取决于党自身各方面的状况，取决于能否在更高的水平上建设党。以适应政治路线的需要来衡量，党内的确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状况，比如，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左”的倾向；组织路线上把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倾向；脱离群众的消极腐败现象；唯书、唯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等等。这些都属于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党风方面的问题，它既影响着党本身的健康和成长，也影响着党的威信和领导作用的发挥，影响着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大局。无论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党和人民事业遭受损害，甚至出现大的曲折和倒退。而这种结果如真的出现，势必反过来影响党自身，使党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种危险性和紧迫性，实际也就是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呼唤，因此，我们必须把切实加强执政党建设认真地毫不迟缓地付诸实践，努力把党的自身建设和改革推向更高的层次和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执政党的特殊运动规律

正确地解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重要的是弄清执政党的特殊运动规律，亦即党执政后同执政前的区别。

所谓“执政党”，是指组织政府并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它可以通过政府的日常活动来推行自己的纲领、政策、方针和主张。执政党是相对于不执政的、一般意义的政党来说的，“执政”强调的是政治地位，即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区别于一般政党的标志，也是它自身一系列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即代表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劳动者，执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领导权的政党。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斗争实践中由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变为合法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党。就是说，它不仅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正确性，而且具有属于统治地位的特性。应该说，这正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根本特点。

具体来讲，执政党的特殊运动规律，亦即党执政后同执政前的区别，或者说执政党的基本特点和所包含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

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成为占统治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简言之，国家在表面上似乎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但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自己并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个强大武器。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处于被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压迫、屠杀、围剿的地位，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甚至未能取得如西方国家所说的“在野党”的位置。在领导权问题上，党“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① 新中国诞生，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国家的性质起了根本性转变，它已不再是同人民对立的异己力量，而是人民为自己事业服务的工具。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政治过程，掌握和指导着政治运行的利益确定过程和利益实现过程，并作用于利益维护过程。党的领导作用通过执政来体现。党的组织分布于全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每一个重要企业，分布于各个民族。许多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领导工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8页。

共产党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党和国家的关系，在执政前后的这一变化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变化也清楚地说明，我们党的状况对于国家生活的影响，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直接。当然，无论党和国家的关系变化多么巨大，党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同一事物，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仅就功能作用而言也不能等同视之。“执政”不是“执行政府职能”，党也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党的领导不能理解为是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不能理解为大事小事，党的领导干部都直接出面处理、直接干预国家机关职能范围的工作。党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说明的是：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

2. 党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正因如此，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信任和拥护，党当时尽管不掌握全国政权，但仍能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鼓舞作用、组织作用、教育作用、引导作用。人民群众视共产党为救星，一心一意跟党走。共产党

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走武装革命的道路，打出块块地盘，建立起根据地，经过了28年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国之后，人民群众更把党看作不可须臾离开的明灯，继续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和人民群众仍然保持了血肉般密切的关系。就在党由被统治到统治、由不执政到执政的转变之间，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又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从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广大人民的武器，变成了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少数剥削者的反抗和建设新社会的强大武器。这种巨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机器的质的反映。但这里有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新中国如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受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的限制，人民还不可能直接掌握全部权力。因此，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部权力归人民；另一方面，现实只能通过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掌握政权。换言之，人民民主专政确定了国家政权的性质，而管理国家事物的只是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各级政权机关。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样，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就不仅仅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是领导政权的核心。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领导政权的核心。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为着实现人民民主而产生、而存在的，从来“不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种工具”，它在任何时候

候都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而是一贯地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奋斗；由于，尽管“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可是，没有党的、不跟着坚强的党走的群众是涣散的，没有觉悟的，不能自制的，他们会变成那些总是‘按时’从统治阶级当中钻出来利用‘适当’时机的狡猾政客的玩物”^①，人民民主需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一致的，这是党与人民关系的新发展。

但是，党和人民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党领导国家政权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权”与“所有权”事实上分离，因而保持协调一致而避免摩擦碰撞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群众同国家机关的矛盾、主人与公仆的矛盾，往往变成人民群众同党的矛盾，甚至导致党同群众的对立状况。比如，江泽民在1989年讲：“近几年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滋生，而惩治又不够得力，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忧虑。加上国内外反动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分子借机挑拨，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受到了严重损害。这种状况，降低党的威信，影响人民政权的巩固。”所以，他郑重告诫全党：“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②，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

党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发展，要求共产党在执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38页。

② 转引自《求是》1990年第13期。

政条件下，进一步确认和坚持组织与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其题中之义即：党领导国家生活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党必须通过自己的领导活动来维护和保证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党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并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断补充、完善和贯彻执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才能当家作主，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因而，我们把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处理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关系的重要原则，就必须一方面坚持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的观点，同否定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观点和作风进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以人民利益为重，运用一切条件和渠道支持、保障人民群众自己来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用先进的思想教育和引导群众，使群众能超出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为争取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斗争，避免群众放任自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倾向。

3. 党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共产党在执政前，处于非法地位，无法进入政治过程，参与利益确定和控制利益实现过程更不可能。党的任务只能是领导人民打碎旧世界，工作中心在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成为政治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党在革命过程中的革命领导权发展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领导权，党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既包括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也包括以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益发展生产力。这是一项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的新任务。党的任务由破坏一个旧世界，领导革命，夺取政权，进到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世界，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进一步来看，共产党执政后同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执政后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大不相同的。

从经济方面讲，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每次革命，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在其代替之前，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社会内部孕育、发展，随着新阶级的跃起，革命胜利，旧生产关系的束缚被打破，新生产关系顺利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则不同，“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旧社会内孕育和发展起来，它的建立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争得政权之后。所以，共产党执政，只是标志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的新阶段刚刚开始。

从政治方面讲，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地位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为此，他们可以把旧的国家机器全部接受下来。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①重新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型国家机器，那是政治上更为深刻更为艰巨的任务。

从社会精神文化方面讲，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②创造崭新的，以维护公有制为核心的，高于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灿烂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

总之，共产党执政后，便“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③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建设一个“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是更为艰巨复杂的。

4. 党组织的吸引力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执政后，较之以前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其作用力之大，作用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党的事业所取得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责任的加重和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党在人民中间威信的增长。

党组织吸引力的增强，对于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党领导作用的实现和历史使命的完成，都是极为有利的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素。但这种变化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建国之初，陈云同志曾讲过：“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①

在执政以前，激烈的战争环境、艰苦的工作条件、菲薄的物质待遇、反动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和高压手段，象是阻隔党组织吸引力的道道屏障。加入共产党就意味着放弃升官发财的机会、放弃优裕安适的生活，吃大苦、履艰险，甚至被捕、坐牢、受刑、杀头、祸及亲友，从而使那些意志不坚定者，使那些追求功名利禄、专为自己打算的庸碌之辈、政治掮客，望而却步，不敢与共产党沾边。客观上来讲，这对于每个要求加入共产党人的入党动机，的确是一个严格的检验；对于入党动机不纯的投机者，的确能够有效的防止和淘汰；对于一些党员头脑中潜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确是一种抑制和改造。

党执政以后，原先的道道屏障都拆除了，党组织的吸引力得到了充分展示，单单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就包含有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第217页。

万分的光荣和自豪，单单是党的政治成就和影响就蕴存着无限的荣誉和希望，单单是“执政”二字就令许许多多的人心向神往。环境和形势已不是在阻隔而是在推动各种各样的人涌向党组织。这就使思想动机不纯者混入党内的机会增多了。同时，党在革命时期，基本上是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骨干的组织，他们以革命为终身职业，是阶级的精华、民族的脊梁、无产阶级最觉悟的部分。在执政后，党迅速发展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不能再称作是一个纯粹革命家的组织，环境和条件也允许为工作与职务提供越来越较前优裕的待遇。尽管原则上讲，党内都是平等的，党员只有职务的不同、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的不同，党内不允许有特殊党员，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没有待遇上的差别，并且职务和分工在和平条件下往往又被视作待遇的标志，这对一些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因而，党员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膨胀的可能增大了。

总之，随着党组织吸引力的空前增强，思想动机不纯者混入党内的机会增多了，党员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膨胀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成为党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和组织建设任务。

5.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的中层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以此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属于阶级联盟。由于民主党派的根本政治主张或主张的核心是反帝爱国要求民主，与共产党有着合作的思想基础；由于中国共产党